

绪论 语言和语言学

一 具体语言的研究和语言学

语言学 顾名思义 自然是研究语言的科学 它的基本任务是要弄清楚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我们这本《基础语言学教程》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来研究语言的规律，尽可能使人们通过汉语去了解语言学的基本原理。

语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它有三个发源地：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在过去，人们认为古代经典著作的语言是学习的榜样和写作的典范，需要好好学习和掌握，因此古代书面语成了语言研究的对象，口语被看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言俗语，不予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研究的任务也就只是给古代留传下来的政治、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经典作注解，而不是探索语言的规律。所以，那时语言研究处于从属的地位，还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学科，这就是所谓传统的语文学。在我国，古代书面语——文言文——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围绕着阅读先秦典籍的需要，人们抓住汉字，分析它的形体，讲求它的古代读音和意义，形成了统称为“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即我国传统语文学。在印度，记载宗教典籍的梵语成为研究的对象，为了准确地解读神圣的经文，语音和语法的研究很早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欧洲，希腊的哲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像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也为后来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马时代的哲学文化思想是希腊传统的继承，拉丁语的分布范围广，使用的时间长，欧洲各国使用古典拉丁文有一千多年，语法、修辞、逻辑是学校传授的主课，语言研究围绕着拉丁文进行，编出了种种语法、词典、读本。梵语、希腊语、拉丁语都是印欧系语言，它们的研究成果容易相互吸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传

统与希腊-罗马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印欧语研究传统，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汉语的研究也开始探索与印欧语研究传统相结合的道路。但是，汉语的结构与印欧系语言不同，因而这一结合道路的探索艰难而困苦，至今也很难说已取得成功。这是中国语言学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语言本身的构造很复杂，需要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去研究。通常的办法是先把语言分成语音、语义、语汇、语法四个部分，然后去描写它们在某个时代的状况，或者探索它们的历史演变，或者比较一些有共同来源的语言的差异去探索语言在史前时期的发展。语言是人们维持社会联系、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和使用者的心理也有很密切的联系，因而还可以从它与社会的关系、与使用者的心理的关系进行研究。以上这些都是就研究一种语言的基本内容来说的。综合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归纳出语言的一般规律，这是理论语言学的任务。理论语言学的水平决定于具体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有些语言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大部分语言还研究得很不够，甚至还没有人去研究。所以理论语言学就其目前的状况来说，基本上是西方语言学家根据印欧系语言的研究成果而总结出来的，有待于不断补充和修正。汉语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没有理论研究的传统。我们现在所用的语言理论都是外来的，基本上没有考虑汉语和其他东方语言的研究成果，因而很难用来解释像汉语这一类语言的结构和演变。这是中西语言学没有实现有效结合的一种具体见证。结合，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必由之路，但结合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立脚点。如果以印欧系语言理论为立脚点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结果只能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审视汉语的结构，不可避免地会抹杀或模糊汉语的特点，弄不清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百年来汉语研究的教训已为此做出了最好的注释，其中尤以语言理论最为明显。我们过去曾经编写过一些语言学理论之类的著作，但基本上是介绍西方的语言理论，列举一些汉语的事实做注释，缺乏独立的研究。这无法实现结合的目的。我们现在编写这部《基础语言学教程》目的是想转变结合的立脚点，以汉语的研究为

基础去摸索中西语言学结合的途径。这是不是与理论语言学要探索语言的共性、“归纳出语言的一般规律”这一基本任务相矛盾？否！共性寄存于特性之中，独特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一般规律的认识；或者说，只有弄清楚隐含于特性之中的语言结构原理，才能真正弄清楚语言的共性或共同的结构原理。汉语研究与理论语言学建设的关系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西方语言学家的总结，应该是我们自己摸索着干。

《基础语言学教程》想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它是理论语言学的一本入门书，我们虽然无法对语言学的各种复杂问题展开讨论，但可以根据转移结合立脚点的精神，紧紧抓住汉语的特点，通过汉语的研究来讲述理论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原理。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原理自然也需要讨论，但和汉语的结构对比着研究，不再把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 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语言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只要有人活动的地方就需要语言。这种情况必然会使不同的学科对语言研究感兴趣，使语言学与其他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语文学时期，语言研究就和各种古文献的研究密不可分，它的成果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所必须利用的，可见语言研究在这些社会科学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研究不仅与社会科学，而且还和很多自然科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联系人们相互交谈的过程来讨论。

人们相互交谈是一种思想交流的活动，话题转换，瞬息即变。这就是说，语言是一种信息的载体。这种人们日以为常的活动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如果借用信息论的术语来说，可以把这种交谈的过程分为“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五个阶段。说话人为了表达一种信息，首先需要在语言中寻找相关的字语，按照语言的语法规则编排起来，进行编码，说话人力求编码清晰、明确，避免失误。编码完成，通过发送器输出。口语的发送器是肺、声带、口腔、

鼻腔、舌头等发音器官。信息一经输出，说话人发音器官所发出的声音就通过空气等通道传递，达到听话人的一方。听话人听到声音，听觉器官开始运转，接收信息，并把它输入大脑，进行解码，将它还原为说话人的编码。这里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这种研究自然与语言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但又不是语言学所能独立完成的。这需要各门学科互相配合，共同协作。编码和解码是思想交流过程的两个根本环节，不过人类大脑怎样进行编码和解码，现在还说不清楚，还有待于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合作进行探索。很多学科都从自己关心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生理学研究语言的发音原理，物理学研究语言的音响传递，心理学关心语言的接收感知，神经学研究语言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生理基础，病理学通过说话的种种现象判断和治疗失语症，情报学研究语言的情报编码以便储存和使用，数学把语言看作素 elements 及其可允许组合的一套数学体系等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某些领域要求交流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因而语言研究又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信息论等学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了改进和扩大语音的传递方式，发明了录音设备，乃至激光通信设备。为了保证通信质量，提出了通信清晰度的问题；为了提高通信线路的效率，使它负荷最大数量的通信量，提出了多余信息的压缩问题。再如深水、外层空间、极度嘈杂环境下的通话，以及保密通信等等，也各有自己的特殊问题需要研究。这种种问题需要声学、无线电电子学、实验语音学、通信技术、计算机科学、信息论、控制论、符号学等等学科来研究解决；它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又需要利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因而会向语言研究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例如，语言信息的处理需要将语言符号转换成各种代码。如何有效地编码、译码，便利在机器、特别在计算机中的使用，就成了专门的课题。语言学正在日益开拓它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协作领域。

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学既是一种古老的科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既与社会科学有密切的关系，也与自然科学有密切的关系。它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其他学科所关心、所运用。它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 语言学的功用和发展前景

语言很重要，没有语言人类就无法与其他动物相区别；语言学也很重要，无论是语文教学还是科学研究，都需要它的指导和帮助。

首先，学习语言文字是提高文化水平、掌握科学技术的基础。广大中小学学生的语文教学是基础教育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成效决定于正确的语言理论的指导。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成效不甚理想，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对汉语的结构规律还缺乏深入的研究，难以提出有效的理论来指导语文教学的实践。我们传统的语文学习办法是“背”熟背古文几百篇、诗词几百首，让学生在“背诵”中悟出语文结构的道理，老师讲解的不是很多。这种办法对学习文言文很有效。现在学的语文主要不是文言文，是接近口语的白话文，无法采用“背”的老办法。五十年代，语言学家根据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编制语法教材，并据此进行基础语法的教学，但效果很不理想，使人们最后发出了“淡化语法”的呼声。为什么？就是语法理论和汉语的实际不是很合拍，不大实用。这个问题现在很尖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来华学习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他们的汉语学习迫切需要语言学的指导。另一方面，为了借鉴外国的经验，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我们需要学习外语。现在，外语已普遍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而且成年人学习外语的也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学习外语或外国学生如何有效地学习汉语？都需要解决教材、教学方法和词典、语法等工具书，一句话，都需要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没有本族语言结构规律的深入研究，没有不同语言的对比研究，就很难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无法有效地满足外语学习的需要。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不同，为了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优秀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还需要学习古代汉语，这就需要进行古今汉语的比较研究，弄清楚汉语的演变规律。这些情况都说明，实践的需要呼唤着语言学，现在的问题是语言的研究落后于实践，还无法很好地解决由实践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语言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第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政策，它的制订需要有语言文字规律的依据。五十年代，我国政府制订了三大语文政策：推广普通话、语言规范化和文字改革。它反映了我们对语言规律的认识。汉语的方言分歧，这不利于各地区人民的往来，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地开展，因而迫切需要确立和推行一种民族共同语；共同语必须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选择哪一种方言做基础方言？这需要有语言学的参与；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确定后，还需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确立一定的标准，使得语音、语汇和语法方面都有一个明确的规范，以减少使用中的分歧；汉字难认、难学、难写、难记，认为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改革，而规范化的共同语则是进行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程。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系列语文问题。三大语文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制订出来的，并根据政治和文化的条件，确立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为此，1955年10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紧接着中国科学院又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讨论有关的方针政策，推动各项工作的展开。推广普通话和语言规范化符合语言演变的规律，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它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文字改革是一百多年来几代人追求的目标，都想仿效西方的文字实现拼音化。现在有很多人对此一目标提出了怀疑，认为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汉字的发展规律都不允许汉字走向拼音化；汉字是与汉语的结构相适应的文字系统，难以实现根本性的改革。汉字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这需要语言学、文字学的研究，弄清楚文字的发展规律、文字与语言结构相适应的规律。总之，语言文字政策的制订如以可靠的语言文字的规律为基础，它就有生命力，不然，实践会提出“抗议”要求修正。语言学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第三，语言学与其他科学既然有密切的关系，语言的深入研究自然也会对一系列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语言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很特殊，它既是社会现象，是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但它本

身的发生、传递和接收的机制又属于自然现象。语言的这种独特的性质决定了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即它既是社会科学，又与自然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语言学是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特殊的学科。正由于此，语言学善于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吸取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推动语言学的发展，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又从语言学中吸取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语言学是联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纽带和桥梁。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十九世纪，语言学从生物学物种变异的比较研究中吸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诞生了历史比较法，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此后，不少人文社会科学仿效语言学的研究，相继诞生了比较法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史学、比较文学等等学科。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相对论代替机械论，量子力学之类的自然科学蓬勃兴起，语言学又从这种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吸取自己需要的营养，诞生了以“位”（如音位、词位）的理论为核心的结构语言学，而这种理论又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到五十年代末已日渐衰落，但在文学等学科中它现在还是一种时髦的理论。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有积极的影响，而且某些自然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求助于语言学。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对计算机科学的影响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具体例证。就整体情况来说，现在语言学的发展滞后，无法满足自然科学发展的需要。有人说，现在不缺第五代计算机科学家，而缺第五代语言学家，这是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社会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学科还会对语言学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预示二十一世纪的语言学将有一个大发展。

我国古代的语言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是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与客观需要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逐步缩短直至消除这个差距，是我国语言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章 什么是语言

第一节 语言和说话

一 平凡的说话和不平凡的真理

看了“什么是语言”这个标题，人们一定会感到很奇怪：每一个人都会说话，谁还不知道语言？真是废话！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人们“会”的事情不一定都“懂”，人人都习以为常的东西，不一定就能知道隐藏在它里面的奥秘。拿钱买东西，谁都会，但是为什么必须用钱才能买到东西？钱的神通为什么有那么大？人们说不出一个究竟。马克思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揭开了其中的奥秘。钱与摆在商店里买卖的任何东西一样，都是一种商品，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买卖任何商品；花钱买东西就是商品交换，而在这种交换中就隐含着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长在苹果树上的苹果成熟了会掉到地上来，不会飞向天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用不着说的真理，但牛顿却在这里得到启示，发现了万有引力的秘密。每个正常的人都会说话，就像每个人都用两条腿走路一样，极其平常，但恰恰是这种平常的现象成为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隐含有深邃的奥秘。这些现象告诉我们，人们习以为常的平凡现象往往隐含有极大的学问，需要好好研究。

在上述那些平凡的现象中，语言最复杂、最难研究。人类对语言发生兴趣并进行研究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隐藏在语言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奥秘？语言的形成经历了千百万年的时间，但

小孩儿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能学会一种语言？我们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能‘不加思索’地说出话来？听话的人为什么也能‘不加思索’地随机应答？等等。我们现在还很难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做出明确而合理的解答。计算机科学发展起来以后，解决了每秒钟亿万次的运算问题。有人曾计算过，假如大脑的运算速度真是像现在已知的任何类型的计算机那样，那么要说出或听懂一个很短的句子也需要好几分钟（帕默，1971,4）。计算机技术最近几十年来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大脑的‘不加思索’就能说出或听懂任何一个句子（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的运算速度相比，那还有天壤之别。现代的语言学家或计算机科学家都还无法有效地说明隐含在这种“不加思索”的运算速度中的奥秘。所以从这些现象来看，要有效地回答“什么是语言？”的问题，前面要走的道路还很长，光靠语言学家的努力还不行，需要一系列其他学科的协助。

“什么是语言”的问题虽然很复杂，难以说清楚，但是人们都在设法回答这个问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语言中的奥秘。有人把它比喻为“瞎子摸象”：摸到鼻子，就说大象像一根粗绳；摸到腿，就说大象像柱子；摸到腹部，就说大象像一堵墙……这个比喻很形象，既说明语言结构的复杂性，人们难以窥其全貌，也说明语言研究的艰巨性，无法一蹴而就。两千多年来，语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在“语言是什么”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做出了很多这样那样的解释，为后人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我们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瞎子摸象”的过程。

二 语言不是说话，也不是所说的话

要弄清楚“什么是语言”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语言与说话不是一回事儿。说话是运用语言跟人们交流思想的行为，是语言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本身不等于语言。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又必须以说话的需要为前提，一个人如果长期生活在孤岛上，没有说话的需要，他就会失去语言能力。抗战时期，山东的青年农民刘连仁

被日军抓到日本当劳工，后逃入北海道的山林中穴居，没有说话的需要，因而他的语言能力也就日渐衰退而不会说话。在他穴居的第 13 年，他看见一条船，想喊一声“船”求救，但舌头不听使唤，转动不灵，喊不出“船”的音来。他意识到失去语言能力的危险，将来遇救，也无法说明自己的来历。于是，他张嘴训练舌头的弹性，以顽强的毅力学说说话，最后才慢慢地说出：“我叫刘连仁，我是中国人，山东高密县人。我是民国三十三年抓来的劳工……”刘连仁为什么在失去语言能力之后又能说出几句简单的话来？因为他原来会说话，失去语言能力之后还记得像我、人、中国、高密县、叫、是、劳工……这样一些字眼儿，还记得“我叫刘连仁”中的“我”得放在“叫”的前面，不能说成“刘连仁叫我”等等。就是说，他还记得一些把字组织起来造句的规则。这件事告诉我们语言与说话的联系与区别：语言好像是一种工具，需要人去用，不用就会“生锈”，就会“退化”，而说话则是人们运用语言工具跟人们交流思想的行为，是为了适应他人的需要而存在的；没有这种需要，人们就会丧失说话的语言能力。

语言和说出来的话也不是一回事儿。《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有这样一段描述：周瑜梦中做忽觉之状，故问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请子翼同寝，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尝饮酒，昨日醉后失事，不知曾说甚言语？”这里的“不知曾说甚言语”的“言语”就是指说出来的话，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不知道曾说过什么样的话”（不是指曾说过什么样的语言，汉语、英语、俄语之类）。

上述这些现象都说明，语言不等于说话，也不等于说出来的话。

三 语言存在于说话和说出来的话之中

这也不等于语言，那也不等于语言，那么，什么是语言？它在哪儿？回答是：语言存在于说话和所说的话之中，人们可以从所说的话中找出语言来。

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说的话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说的话自然更不一样，就是说，人们说出来的话是无限的，即使少量的话可以重

复地说如“今天天气好”之类)也无法改变可说的话是无限的这一事实。从我们的祖先开始说的第一句话算起,千百万年来,历代的人们不知说了多少话,无法计算;今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还会说多少话,更加难以统计。如果我们今天以说汉语的人所说的话为例,那也无法记数,但是,只要我们对这种无穷无尽的话进行一些具体的考察,就会发现不同的人所用的语汇材料和造句的规则都是相同的,或者说,是大同小异的。比方说汉语的人,如果离开了人、手、头、脚、狗、猫、跑、跳、今天、明天、太阳、月亮、红、黄、蓝、白、黑、的、了、呢……这样一些字语,就无法说话。一种语言的语汇材料大致有几十万条,数量尽管庞大,但终有一个限度,而常用的语汇材料,数量还要少得多,如以字数计算,有两三千个左右就可以造出通用的句子,大致就能满足日常说话的需要。计算机上使用的国标汉字是 7700 多个,现在通行的 windows 95 的字库也只有 2 万多个字,人们用这些字就能造出说话时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字语,说出无穷无尽的话语。如果说,这种有一定限度的语汇材料还有几千几万的话,那么组织这些材料、造出句子的语法规则的数量就要少得多了。先请比较下面几句话:

小王打碎了杯子。

小猫撞翻了花盆。

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

这是几句不同的话,但它们使用的规则是一样的,表达的意思都是陈述“小王”“小猫”“中国人民”这些有生命的事物“做”了什么事情。不仅如此,它们的变化规则也是一样的。请比较:

小王打碎了杯子。小猫撞翻了花盆。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杯子打碎了。花盆撞翻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

小王把杯子打碎了。小猫把花盆撞翻了。中国人民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

杯子被小王打碎了。花盆被小猫撞翻了。日本帝国主义被中国人民打败了。

完全不同的几句话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规则，说明语言中的规则是很有限的。这就是说，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是有限的，语汇材料也是有限的，而说的话却是无限的。人们可以根据交流思想的需要自由说话，但是不能杜撰语汇，违反规则。所以在自由中又有不自由，说话只能在这种有限和无限、自由和不自由的矛盾中进行。就是说，每个人说话是自由的，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说话时选择什么材料、遵循什么规则是不自由的，必须服从社会的习惯。语言、说话、说出来的话是不同的事情：语言是说话和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而说话是运用语言进行思想交流的行为，说出来的话则是人们运用语言工具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要寻找语言，就需要仔细收集人们说出来的“话”（“产品”）建立语料库，从中寻找语汇材料和语句的各种结构规则；语料库越大，找出来的材料就越丰富、规则越可靠。从语料库中找出来的语言，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一部词典和一本语法书。它们潜存于每一个人的脑子里，说出来的话都是人们灵活运用语言的结果。

一个人从小学会一种语言，可以说是使用这种语言的权威，最有能耐的语言学家要研究这种语言，也得拜他为师。尽管这样，他对自己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样子，有哪些规则，却往往茫然，说不清楚。语言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把说话中反复使用的语汇材料和规则找出来，把隐藏在无数话语中的见首不见尾的语言找出来，使它的整体和每一片鳞甲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当然是非常复杂细致的任务。

第二节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

一 语言与现实

语言是‘说’的，说话人说出来的话通过声音传递到听话人那里，

听话人“听”到由声音传递过来的信息就会作出相应的反映。“说一听”的过程就是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一般称之为交际。语言是一种交际的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一个语言社团，如说汉语的人组成汉语社团，说英语的人组成英语社团。语言是语言社团中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彼此用语言交流思想进行生产劳动改造现实，不然在认识现实、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就无法协调彼此的行动，社会就会解体。“说一听”的交际过程从表面上看，不过是一串线性的音流，但实际上在这种音流中含有意义、含有思想，表达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因而说出来的话能表达一定的意义，而听话的人也能懂得听到的话的意思。这样看来，由“说一听”过程表现出来的线性音流是一种音与义相结合的非线性结构。对语言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复杂而深邃的道理就隐含在这种音与义的相互关系之中。要弄清楚语言本身的构造，就应该紧紧抓住这种关系的线索。

语言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想是什么？是人们对现实的认识。这里涉及到现实、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语言三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三方面的关系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说明：

现实——语言·思维——现实

公式两端的两个“现实”不是一个东西。第一个“现实”是纯客观的存在，它的性质和规律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现实”体现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已能从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中找出必然性的规律。“语言·思维”是联系两个“现实”的桥梁，这里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实现对现实的认知。语言对第一个“现实”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编码，将客观的现实转化为语言的“码”。例如前述例子中使用过的“小”“猫”“小王”“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打”“碎”等都是汉语的“码”，是现实现象的转化。对第二个“现实”的关系是用码，用语言这个工具去认知现实。当然，用码也属于编码的范畴，但是为了区别于和第一个“现实”的关系，这里使用“用码”这个字眼儿。“编”与“用”一定需要有思维能力的主体去实现，这就是人，

或者说，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群，其他动物没有这种能力。一般动物的叫喊在同类物种中也能传递一定的信息，表示暴怒、惊恐、警告、觅食、求偶等意思，但不是“码”。“码”的形成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使用中要受一定规则的支配，装拆自如，可以重复使用。例如“火”字，它是汉语中的一个“码”，可以和其他的“码”相组配，构成如火把、火锅、火花、战火、鬼火、灯火等，也可以从这些组配的构件上拆下来，再和其他的“码”相组配，构成如烟火、烧火、火种等单位，以及如“纸是包不住火的”“火的发明是人类进步的标志”这样的句子。“火”就是汉语中一个装拆自如的“码”，可以重复使用，并且所表示的意思也一样。“码”的使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般动物的叫喊都是受当时当地的刺激引发的，是对具体情景的感性反映，只能传递某种信息，既不能向同伴告知发生于过去的事情，也不能设想未来。只有人类才能用“编”出来的“码”说古道今，表达深邃的哲理，翱翔于丰富的想像，思想驰骋到哪里，它就能如影随形地跟随到哪里。人类的语言和其他动物的叫喊为什么有这些原则的区别？就是由于人类具有对现实现象进行分析、综合的思维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实现。所以，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非洲有一个民族的语言很有意思，把新生的婴儿叫做 kuntu(物)到孩子学会了说话才把他叫做 muntu(人)，这种现象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认识。鉴于语言在认知现实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将语言定义为现实的编码体系。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是一个大题目，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复杂，需要从不同的方面去认识。我们这本书将讨论三方面问题：一、语言的构造；二、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三、语言的演变。第一个问题是全书的重点，将以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为纲，分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等方面展开讨论，然后再讨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的演变等问题。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里的“体系”二字是就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而言，而就语言本身的构造来说，我们的一般用语是“系统”。为什么要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体系”着眼于不同事物因相互联

系而构成的整体，“系统”则是指同类事物按一定的关系而组成的整体。我们研究语言的结构只涉及语言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以“系统”这一概念为宜。

二 语言是认知现实的一种符号系统

语言与第一个现实的关系是编码。所谓“编码”，就是将客观现实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符号，使其成为客观现实现象的标志。说得更简单一点，符号就是现实现象的代表。人们掌握了这种符号，就可以把它作为交际的工具，认知现实；不经这种转化，实物无法成为交际的工具。有一本童话小说，《格列佛游记》作者是乔纳森·斯威夫特。这本书孩子们很爱看。书里写到飞岛国里的百姓想绕开语言用实物来进行交际，于是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可能要说到的全部东西，想要表达什么，就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东西来。这种交际方式只有在童话或幻想小说中才有可能，人类社会的交际不能采用这种方式。且不说那个口袋该有多大的容量，好多东西如水、火等还无法往里装，而且更多的交际内容，比方“远近”“喜欢”“真理”等等，根本就不是具体的东西，你想装也装不了。人类用来交际的不是实在的事物，而是代表事物的符号。汉语的“字”、英语的“词”都是一种符号。例如我说“火”或 fire，人们听了就知道它代表“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语言中像“火”或 fire 这样的字或词都是现实现象的符号。掌握符号，就是知道了符号所代表的是哪一类事物。这正像商品交换中的货币那样，一个人如果有了货币就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与此相类似，一个人如果在脑子里储存了符号和符号的组成规则，就可以和别人交际，谈论各种事情。

符号的构造可以细分为音与义两个方面。“义”是现实现象的转化或反映，但它必须和一定的语音形式相结合，不然就是一片混沌、模糊的东西，人们难以掌握，同样，声音也只有和一定的意义相结合，才能呈现出清晰的界限。只有声音链条的区分和意义链条的区分相

对应，这种音与义的结合才能组成一个符号。像汉语的“火”字，^{huo}是它的音；“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光和焰”是它的义。音和义相结合就组成了汉语的一个符号。我们听没有学过的外语，只听到一串乱糟糟的音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由于我们不知道音与义结合的界限。将现实现象转化为意义，用声音来表达，形成符号，这是人类为认知现实、改造现实而创造的一种最有效的交际工具，因为它的容量最大、使用最简便、效果也最好。语音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声音。发音器官每个人都有，随身携带，人走到哪里，它就能跟到哪里。张嘴就能说说，既不需要像大人国里的人那样背着一个大口袋，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专门的物质设备（即使像旗语这种简单的交际工具，也还需要两根棍子、两块布），语言的运转最灵便，容量也最大。每一种语言从发音器官所能够发出来的音中选择几十个音通过排列组合组成不同的音节或音节的组合，就可以把现实世界中的所有的现象都表达出来，而且它的效果也最好。因为说话只是动“嘴皮子”，可以大声疾呼，也可以慢声细语，上下古今，喜怒哀乐，不管多么复杂的道理，都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如果改用手势，效果就要差不少：远处看不清，暗处看不见；深奥的哲理，细腻的感情，也难以用手势来表达；而且做手势时还得把双手腾出来，影响劳动。由于用声音作语言符号的材料有种种优越性，因而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就选用它做交际工具的物质形式。

音义结合是语言符号的一种最基本的性质，也正由于此，语言符号中的音义关系也就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但也是最复杂的问题。由于它涉及很多方面，过于复杂，我们留待第七章再进行具体的讨论，这里大家需要牢牢记住的是：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的产物。正由于此，语言学既需要研究语言的音——语音，也需要研究语言的义——语义。它们构成语言学基础性研究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语言符号的总和就是一般所说的语汇。但是，光是一个个零散的符号，人们难以掌握，也无法用来交流思想。只有把符号组织起来，使之相互依存，形成一个系统，它才能成为维系社会人群的纽带和

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个部分就是语法。从语言符号音与义的结合，到符号语音的结构、语义的结构，直至由语言符号相互关系构成的语汇和语法，形成语言系统的不同结构层次。它们相互制约，低层隶属于高层（例如符号隶属于语法，接受它的支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个语言就是以符号为基础而构成的系统。这种系统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自发性，是语言自身在运行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或者说，是人们在长期的交际过程中相互调整、相互校正、相互适应的结果，最后不知不觉地使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自发地磨合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堕入这个严密的系统，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要求更改的权利，即使是王侯将相，也得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接受全社会统一的语言，无法享受任何特权。语言像是孙猴子戴的紧箍，套在每个人的头上，谁要违背已经形成的社会习惯，社会就会“念念有词”，迫使它改回来。这种强制性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不是权威的规定，也不是语言社团开会的决议。这种自发地在交际中相互协调、相互校正、以形成语言的各种规则的过程，就是语言社会性特点的一种重要表现。人们现在一般用“自组织性”这个概念来解释语言系统的性质。“自组织”这个概念来自自然科学，意思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经过突变而能自发地产生各种有组织、有规律的现象。例如，各种生物都是由各种细胞按照精确的规律组成的高度有序的结构。一个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是从少数细胞开始的，由此发展成各种复杂有序的器官，而所有的细胞则由很多原来无序的原子构成。语言系统的基本精神与此相似，由各种大小不同的结构单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层次、有规律地组成一个高度有序的结构，使之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它的运转和演变的动力不是来自外部，而完全依靠语言内部各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其中一个结构成分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其他结构成分的变化。语言系统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的特点。这里不妨先借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一个局部的系统性问题：

正和负。也可以反过来……北和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